

理论探索

文学的“公”与“私”——如何重建个体写作与社会公共性的感知纽带

□钟 媛

近30年来,我们拥有史上最多的写作者和作品,但是,真正能触动公众心灵、引发社会共振的文学作品却非常少。在一些作家的笔下,“文学”退回私人化叙事,甚至沦为小群体之间的智力游戏。文学中的“个人”变成了原子化的、计算利害的“精致利己者”,与找不到意义的“虚无游荡者”。个体意识在崛起,专业精神在确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失去了传统的道统,我们的文学如何建构起更加有效的公共性?文学的“公”与“私”在当下如何达到一种更加辩证的和谐?在新时代,不能让“我”与“我们”、文学与时代之间的感知发生断裂,不能让文学失去处理“我们如何共同生活”这个根本问题的能力。面对这样的现实,文学的出路究竟何在?新时代,文学何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是每一个文学从业者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一、谁“扼杀”了公共写作

有人问,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文学倡导“个人叙事”“艺术探索”,为什么不存在问题?当年,舒婷在写下《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作品时,个体的尊严、爱情平等的呼唤与社会反思的诉求,“人的觉醒”构成了深切互动。1980年,她参加《诗刊》首届青春诗会,与众多的青年诗人一起,深度参与并塑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诗歌的新潮流。他们的书写,既承载一代人对历史创伤的隐痛,又以诗为媒,参与重构了1980年代中国社会关于人、爱与祖国的想象边界,深刻契合着那个年代“启蒙与困惑交织”的文化心理,成为连接社会变革与人文复兴的重要文学桥梁,其影响力远超诗坛,渗透到青年文化、性别意识与公共话语之中。

舒婷及朦胧诗仅仅是一个个案,不仅显现出那个年代文学场域的开放与张力,也体现了文学与时代的同气相求以及“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等历史潮流的同声相应。而这也反过来推动形成了作家、诗人、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彼时,文学既是先锋的,又是流行的;既是知识启蒙的,又是大众期待的。甚至个人情感的书写,个体经验的表达本身便是公共性的一种显现。于是,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时代经验不是撕裂的,个人与时代之间没有嫌隙,“我”的经验便是“我们”的、时代的经验的一部分,“我”的呼唤也映照着时代的呼唤。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实践中去探索 and 逐步求得解决”。作家们积极推进以精神解放、艺术创新为核心的创作实践,在激活个体精神的同时也完成了时代使命。

更远一点来说,即便是近现代,文学依然是为“新民”和“民族独立”服务的重要力量。梁启超强调“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鲁迅弃医从文,以小说、杂文等文体大声疾呼破除陈腐的旧观念,将个人的觉醒与国家、民族的觉醒呈现于文学之中……由此,文学成为记录并推动“个人”从僵化沉滞的“旧制度”中解放出来的“火种”。

在中国古代,个人与家国、文学与时代之间的联系亦是如此。古代的文人不是原子化的个体,而是家族、社区、国家链条上的一环。读书人的核心价值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修养和家国责任是统一的。

在文字的天地中绽放生命光彩

(上接第1版)

与此同时,更多的中国残疾人故事正走向世界。自2016年起,中国残联每年遴选1至2部残疾人作家精品图书开展对外翻译出版,向海外读者生动讲述中国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奋斗故事。来自辽宁葫芦岛的重度肢残作家李伶俐便是该项目的受益者之一,《李伶俐作品精选(英文版)》收入她创作的111篇小小说,细腻书写人间温情,深刻诠释生命力量。她15岁时因病辍学,后自学写作,专注于小小说创作,出版了《起舞》《羊事》等6部小说集,获评“全国自强模范”“葫芦岛好人·时代楷模”。在李伶俐的带动下,葫芦岛涌现出一批小小说创作者,每年都有数十篇小小说作品发表于全国各类报刊,地方文学创作氛围持续升温。

分类施策,探索更加适配的培育模式

随着扶持体系的日趋完善、创作队伍的持续壮大、优质作品的不断涌现,我国残疾人文学事业稳步前行、蓬勃向上。“残疾人作家的作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领域的一道独特景观,更在精神层面上给予读者深刻的共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桦看来,文学作为一种公共话语,其传播和讨论有助于增进公众对残疾人的理解和包容,推动全社会对残疾人工作的关注,促进相关政策的完善和公共服务的提升,积极推动建设更具包容性、更尊重差异性的文明社会。

“残疾人比健全人更能体味生活的艰辛与无常、生命的痛苦与挣扎,他们的作品蕴含着对自我、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洞察,恰恰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独特的视角。”白桦认为,文学是残疾人作家抚慰心灵的良药,是自我表达与自我实现的工具,也是他们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手段。身体的障碍可能限制了他们的行动,但文学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广阔世界的大门。“从史铁生、陈村、张海迪,到郭丞、余秀华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残疾人作家的生命与创作本身就是自立自强的最佳例证。”

文学在其中,是对江山社稷的记录,是对公共记忆的书写,“文以载道”是其核心。于“公”而言,文学是士大夫群体传递儒家道统、教化民众、匡正政治的工具;于“私”而言,文学是他们为沉默的民众代言的工具,或是在仕途受阻时抒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绪通道。其中,个人的失意天然地易被转化为对公共命运的关切。文学成为连接私人情感与公共责任的重要通道。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以及由顾炎武提出、经梁启超提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是这种“公学”效用的显现。

而当下,“人”与“文”在经历了双重“解构”后,文学失去了公共的锚点,“向内坍塌”越来越明显。从上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叙事到当下的“小时代”美学,写作越来越在无物之阵中游荡。当个人不再需要为自己的情感寻找公共意义,当文学完成了解构,“祛魅”与专业化、市场化和学院化,不再回答“我们该如何共同生活”,就变成了一场“共谋的撤退”——二者互相印证、互相合法化。作家写小时代,而“我”活成小时代;“我”只活成小时代,所以作家也只能写小时代。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能被普遍认同的公共叙事来凝聚写作者了。写作者不再相信自己能“代言”任何人,也不再有能力或意愿去把握整体性的社会结构问题。而受众也不再相信“权威”的存在,甚至怀疑“公共”本身是否存在。很显然,整个知识生产机制与社会氛围在其中都难辞其咎,因为公共领域本身已经碎片化了。

如果客观现实如此,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难道我们要忠实于这种分裂并沉沦其中吗?难道这种现象在当下的语境中本身不构成一个问题吗?是谁“扼杀”了文学的“公共写作”功能?也许,我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责任,但首要的是承认现实。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并承认这已构成一个问题。

二、大文学观如何重建文学公共性

如果承认了这是个问题,那紧接着便亟需“观念”的转变与行动的实践。实际上,大文学观的提出,便是一种介入姿态的话语探索,也是一次关于文学何为、文学何去的集体反思,更是植根于深刻现实困境与媒介变革之中的“自我拯救”。

这个时代正在发生一系列颠覆性变化,我们首先需要找到我们的时代命题。如果一味退守个人或作为小圈子内的文学写作,文学也就丧失了其作为公共之物的力量。“退守个人”固然不失为一种理性策略,因为对外部的公共责任保持一种“优雅”的、不投入的姿态便不会有风险。这种情况在过去30年不断演化,但当下形势与时代在倒逼——媒介技术革命已经横扫我们的生活,从“印刷文明”“工业文明”一跃进入了“数字信息文明”,创作不再是少数精英或作家的专利,“素人写作”借助网络平台,让文学从职业回归为一种生活,文学正在从“小而精”走向“大而杂”。我们要明白,大文学观的提出在现实逻辑上有坚实的客观基础,是试图解决真问题、应对真挑战的主动探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二元对立,而是强调扩展。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出文学究竟是“公学”还是“私学”的“当下之问”,目的不是让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或“观念的

传声筒”,而是重新建立文学与社会公共议题之间的有机联系。重回文学的“公学之维”,不是让文学重新跪倒在任何一种“道”脚下,而是让文学重新长出联结的能力——联结个人的疼痛与公共的结构,联结一个人的眼泪与千万人的命运。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成熟的现代社会中,“公”不是“私”的对立面,而是“私”的更高的实现形式。同样,大文学观的使命在于找到一种既不放弃文学在语言、形式探索上的成果,又能有力介入现实的辩证路径。

那么,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命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如果说古代文人有“道统”,近代作家有“救亡与启蒙”,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命题?这样的思考,需要我们在这个时代语境中重新提出并积极推进。窃以为,这个时代需要文学重新发挥出建构与重构的力量。当下需要文化与文学为人民精神困境提供支持力量,给予分散的个体以“凝聚”与“共识”。当然,这不是要求每个作家都写宏大题材,而是要有意识地将个人经验置于社会结构中进行考量。我们有必要重提“文以载道”——不是载旧道,而是载新道,载“联结之道”。让文学成为个人与他人、社会、国家之间的血肉纽带,这是当代写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需要观念革新与写作伦理的调整。写作者需要意识到个人就是最小的公共单位。当一位作家选择只写个人的“小确幸”“小烦恼”“小欲望”时,他是在行使创作自由,还是在逃避公共责任?一个写作者,如果只是将作品放在抽屉里,面向自我,那么,这时文学完全可以漫无边际地展现自我与“私域”。但是,如果一个写作者将个人作品投向了公众能见的视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已经带有面向“公域”的特征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每个写作个体都应思考个体写作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需要讨论辨析。

其次,我们也应意识到“跨界叙事”是一种必然趋势,从“小圈子”走向“公共对话”也是大文学观下的必然命题。一方面,多媒体的转化与融合发展已是流行趋势,很多已经破圈的文学作品正好也是借此东风。另一方面,近十年来,许多非虚构作品的成功证明,文学的“跨界叙事”要求作家走向生活,进入工地、学校、乡村、流水线,直接处理公共问题,但方式可以是个体的、具有叙事性的,而不是导向空泛议论。文学需要吸收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视野,破除专业主义的局限。同时,文学奖、刊物、批评家也需要投入公共议题,不能再是圈子内的相互吹捧。这是一个系统的重构过程,但每一小点的努力都在其中发挥作用。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重建一整套“文学一制度一情感”之间的有效的转化机制。质言之,让文学重回“公学”的唯一道路,不是回避分裂,而是直面分裂——把个人与国家、社会、时代之间的张力作为写作的核心母题。不是以空泛的口号大声疾呼“我代表集体”,而是去写作为一个个体的“我”以及“我”的个人经验,是如何被社会结构生产出来的,是如何进入一个集体与民族的整体进程之中的。

总之,让文学重新成为个人与他者、集体之间的血肉纽带,这不是怀旧,而是自救——因为一个缺乏公共关怀的社会,最终会让每一个人都活在薄冰之上。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研究处副处长)

八方文讯

《纸上的生活》钩织珍贵的生活画卷

《纸上的生活》新书分享会近日在苏州大学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编辑程永新及该书作者王尧与会,围绕“生活在此岸,记忆在别处”这一主题展开交流分享。

散文集《纸上的生活》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王尧近年来创作的散文作品。在苏杭柔美的城市背景里,作者钩织出自己人生中细碎又珍贵的生活画卷,让一个个生动的意象跃然纸上,力求用诗意轻快的文字打开读者对生活、对时间的新感知。与会者谈到,该书将一些普通的事件细节提炼成富有诗意的画面,打破了时空界限,却又在跳跃中构成了有机的整体,展现出作者很强的个人风格。王尧坦言,这是自己“迄今为止最自由、最斑斓的一本书”,书中的文章大多来自其在《上海文学》开设的同名专栏,将小说的叙事手法、诗歌的语言节奏和学术的思辨方式融合其中。

“艺术界”少年作家创作中心揭牌

为深耕儿童文学创作沃土,搭建专业优质的儿童文学交流成长平台,7月2日,“艺术界”少年作家创作中心揭牌仪式在安徽合肥举行。该创作中心由《艺术界·儿童文艺》成立,是其延伸出版价值、深耕儿童文学育人阵地的重要举措。

安徽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陈先发在致辞中表示,创作中心要把对少年儿童的关爱放在首位,为少年儿童传递文学的力量,让文学艺术之美助力少年儿童成长。期待少年儿童拿起笔,在写作的过程中感受人生、感受自己、感受世间万物,丰富内心世界,不断成长。仪式现场为创作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会联席主席代表、首席文学导师、秘书长颁发了聘任证书。

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纂学术论坛举办

《刘醒龙文学年谱》暨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纂学术论坛日前在湖北武汉举行。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继文,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永林,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湖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悦,武汉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胡金利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作家刘醒龙与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刘醒龙文学年谱》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刘早编纂。全书以时间为主线,依托翔实文献与影像资料,系统梳理了刘醒龙1956年至2025年间的人生轨迹与全部文学活动;通过三层叙事脉络,深挖作家细腻深邃的创作心理与完整精神成长路径,为刘醒龙专题研究搭建起系统完备、史料丰富的文献支撑。与会专家认为,年谱依托一手史料还原作家完整、立体的创作面貌,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有助于推动当代文学研究。作家年谱类史料整理与编纂工作仍有较大学术挖掘空间,需要学界持续投入精力。

书 评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郭久麟在半个多世纪里潜心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在常年的“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阃以穷照,驯致以绎辟”之后,终于在80多岁高龄撰成《中国新诗百年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由西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厚达600页的诗歌史著,细致描画了中国新诗100多年来的发展演进轨迹,全面总结了百年新诗的历史成绩,不愧为一部“体大虑周”的新诗史著述。而著者在历史陈述之外,还能针对百年新诗中的思潮、流派、诗人与诗作,大胆发表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给人以诸多的启发。

我们通常所见的通史类学术著作,往往都是多人合作的成果,由一人独立完成的通史其实并不多见。事实上,对长时段历史的描述和勘探,总是一件极其繁难的事情。对百年新诗历史发展的完整陈述自然也不例外。其牵涉人事之多,史料搜集与整理之琐细,历史审视与判断之复杂,自不必多说。由此引发的涉及体力和脑力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也是巨大的。在此情形下,通史的写作工作由多人去完成,就可以使繁重的体力和脑力活儿得到分担。这本《通史》则只出自一人之手,其克服困难的勇气与毅力着实令人敬佩。郭久麟积60年之苦心经营,对百年新诗的各类史料进行了全面的搜集整理,用以支撑自己的历史讲述和美学阐发,因此,其著作给人以史料翔实、论据充足之感。这本通史在翔实充盈的史料支撑之下,对中国新诗百余年来的三大潮流,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潮流,进行了总体性的鸟瞰与概论;又立于历史的维度,从新诗奠基期、新诗拓展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时期、1980年代后期、21世纪初期等几个时段对中国新诗的前行线路和演变轨迹进行全面描摹。历时性阐发之后,《通史》还从共时性角度对中国百年工业诗歌的发展、百年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百年格律体新诗的发展、百年新古体诗的发展进行了精要概述。整部著作的体系之庞大,考量之周全,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要做好百年新诗历史阐述工作,光有体力和脑力的付出还远远不够,学者自身具有的敏锐艺术感悟力和深邃历史洞察力也必不可少。唯其如此,才可能拨开琐碎史料的层层迷雾,深入挖掘百年新诗的美学奥秘和历史底蕴,得出契合历史事实和时代精神的学术结论。《通史》对百年新诗思潮与流派的细致剖析,对200余位诗人的大量诗作的文本细读和价值评判,处处都显得理据十足,立论公允公正,学术视野显得极为开放包容,学术结论也令人十分信服。譬如,《通史》对于诗歌潮流的评判,称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潮流“真正让新诗在中国文坛站稳脚跟”,称李金发《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的出版,使得“19世纪末兴起于欧洲的象征主义诗歌也在我国传播开来”。这些立论都是客观稳妥,较为符合历史真实的。

学术著作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即便是历史阐述的学术性著作,其创新性追求也必不可少。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对历史风云中曾经出现的人与事的简单直描,而更需要有对历史事实的处理和对历史深意的“发现”,因为原初形态的历史现场总是鱼龙混杂、真假莫辨的。在西方历史学家那里,无论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强调了对历史的重新发现 and 对其内在精神的重新阐释。这部《通史》的创新性也随处可见。首先是史料挖掘上的创新,如少数民族诗歌、新古体诗发展史料的整理与发掘,其次是观点上的创新,如论著借鉴了贺敬之的说法,称现代诗人创作的旧体诗为“新古体诗”,并肯定这类诗歌虽用的是传统的体式,但“在内容和语言上”“带上了新的时代的色彩”,因而应被纳入百年新诗历史谱系。这样的观点无疑打破了诗学界固有的成见,凸显着鲜明的创新意义。

总体来看,《通史》在宏观上体现为庞大的历史体系建构,在微观上呈现出观点和见解上的创新,因而成了近年来出现的不可多得的体系完备、见识卓越的百年新诗史著作,为中国百余年来的新诗发展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

(作者系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屈原爱国怀乡诗歌文化推广季举行

7月4日至5日,屈子行吟·诗歌之源——2026湖南·怀化屈原爱国怀乡诗歌文化推广季在湖南溆浦举行。李少君、王山、王跃文、刘合、方铭、毛庆等诗人、学者,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及怀化市委相关领导参加。

活动期间举行了锦乡书院文化雅集、云端诗会等活动,深入挖掘、研讨屈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大家表示,诗歌与山川风物天然同构、共生相融。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串联起溆浦屈原文化历史底蕴与新潮业态,实现了“跟着诗词走,循着文脉看”的沉浸式体验,是一场集文脉溯源与非遗体验于一体的诗意之旅。

2026年度原创文学新晋“白金大神”名单公布

日前,阅文集团公布2026年度原创文学新晋“白金作家”“大神作家”名单。李越人、柳岸花又明、如水意、睡觉会变白、熊狼狗晋升“白金作家”,愤怒的乌贼、怕辣的红椒、沙拉卡斯、阴天神隐、猪心虾仁获评“大神作家”。

“白金作家”与“大神作家”旨在表彰作品质量过硬、读者口碑稳定、长期持续创作的优秀网络文学创作者。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70位网络作家获得该荣誉。主办方表示,未来将持续完善作家成长体系与权益保障机制,为不同类型、不同赛道的优秀创作者提供更多发展空间与行业支持,推动网络文学精品内容持续涌现。

苏中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联离休干部、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苏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7月10日在合肥逝世,享年99岁。

苏中,笔名周和,中共党员。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话剧剧本《现场即战场》《反击》,散文集《魂牵梦绕》,报告文学集《麦田公社史》,论文集《生活探索与艺术探索》,评论集《走向文学》《苏中文学评论选》《苏中自选集》等。

杨匡汉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匡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7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杨匡汉,笔名企鵝。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战士与诗人郭小川》《艾青传论》《诗美的奥秘》《缪斯的空间》《创作构思》《诗美的积淀与选择》《渔阳三叠》《中国新诗学》等,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中国当代文学》等。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奖等。

穷搜史料通流变

独辟新见论诗潮

——评郭久麟《中国新诗百年通史》

□张德明